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呈现出多样化格局，种族、性别、阶级、经济、宗教、文化、地区、民族国家等方面的冲突愈演愈烈。利益差别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使得人们难以建立普遍认同体系，为解决冲突奠定价值基础。相互冲突的价值选择不过是现实分裂力量的意识形态表现，价值领域冲突和整合的困难体现了实际生活领域中各种实际利益的不平衡。现实的失衡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与现代社会形成以来生活世界各个层面的分化及其整合的过程有着紧密的关系。它表明凭借过于主观化的工具理性建立普遍化生活秩序的现代性构想与现实发展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以抽象的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单一现代性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在这一背景下，能否凭借理性揭示当前多样化矛盾冲突格局的实质，建立起被广泛接受的价值共识，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对抗限制在和平发展的范围之内，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作为对现实冲突的回应，当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主体中心理性批判、目的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区分呈现出回归生活世界的趋势，它们力图从生活世界是普遍共识的来源出发重建理性观念，为生活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价值尺度。本文拟从生活世界的现实及其价值维度出发，对生活世界理论加以评述。

## 一、生活世界的理智理性重构及其问题

回顾历史上的“生活观”，可以看到解决时代矛盾和摆脱现实困境的努力总是伴随着重构生活世界的设想和尝试。在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生活的发展和崩溃过程中，面对个人利益、欲望和任性对传统礼法、习俗和神谕下的共同体生活原则的破坏，人们认识到：按照普遍的共同善、公正还是按照个人私利和主观任性来组织共同体生活，是相互冲突的选择。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坚持应该在个体的内心世界中发展出普遍的理性道德认识，重建共同体和个人的统一。苏格拉底以知识理性即德性抵制诡辩和相对主义，强调社会生活的原则是普遍真理。柏拉图认为社会生活原则本身的客观真实是建立在理性理念本身无条件的自主性之上的，普遍的德行是客观存在的、自在自为的真理，应该在共同体生活中得到彻底贯彻；个人必须以普遍真理作为自己的目的，把自己的意志、行为和生活完全纳入到体现客观真理的国家中去。亚里士多德反对把理性看成是排斥实在环节的客观原则。按照目的论和生命原则，他指出，事物的本性在充分的发展中实现自己的真实性就是合乎德性和善，而最优良的生活在于通过城邦共同体道德生活充分实现各种本性，达到个人灵魂平衡和共同体的秩序。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高度分化和文明的拓展，已经失去了通过自在自为的理性原则、共同善的理念组织有机共同体的可能性；建立在个人怀疑、经验、体验、判断上的理智知识取代了脱离自我意识和现实的抽象精神，成为个人意志和生活理想的工具，理性被分裂成自由意志和知识理性。基督教末世主义和禁欲主义对世俗生活的控制，由于其本身对人的蔑视、教会的腐败、与世俗政权的冲突以及外在现实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建立普遍的世界秩序。在新的理智知识中，生活世界分裂成为理智世界、内在感性世界和外在的自然世界。人们相信可以认识自然规律并且支配自然，凭借自身力量建立现实世界的幸福。近代对生活世界的思考主要是围绕着个人权利和自由选择进行的，目的不是建立共同体的善，而是把政治、道德作为维护世俗个人普遍权利和精神自由的工具。它从理智理性假定的普遍个人权利出发，分离经济、政治和道德，默认经济的不平等，把平等只看成是存在于自然或政治领域之中。在自然法理论中，以不论财产权为前提的社会政治平等事实上把生活世界分割成真实的和抽象的。以个人财产权为核心的自由资本主义只能导致现实极度的不平等，抽空普遍政治权利的真实内容，使政治和文化成为私有权的压制手段。在自然法随后的理论发展中，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从神秘的历史必然性出发把个人贪欲和盲目任性的私利追求看成是社会普遍利益最大化的途径，而实证主义力图在以计算理性为基础的工业、技术之上组织社会生活，人被理解为单纯的感性物，而理智成了满足感性的手段。针对这些理论及其实践导致的社会生活分裂，历史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开始强调权利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维护理性、情感和感性的完整性，反对凭借抽象理智割裂历史传统的连续性来构造社会生活形式。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使人们看到抽象的思想必须借助中介手段深入个体的内心，成为具体的理想，感性和理性必须找到统一起来的环节。但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中介思想无视技术、分工、社会对抗中存在的真实差别，把矛盾看成是自我意识发展中的不同形式，认为生活中的矛盾及其解决是内在意识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统一的过程和总体，体现这一过程和总体的就是具有等级制度的国家。

19世纪后期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实证主义经济和技术理性的批判又一次成了主题。文化科学强调文化价值与自然的差别，主张价值重估，批判计算理性、主观理性对人的生命力的遏制，反对以理智和计算科学设计的世界取代人的生活世界，对计算理性、理智知识作用的限制构成了对现代社会生活批判意识的基本内容。人们把现代性问题归结为抽象理性的彻底统治带来的后果，尼采的道德系谱学、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韦伯的解释社会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理性和极权主义批判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判断都是如此。它们没有看到去魅化的知识理性、建立在这种理性基础之上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真实作用及其与生活世界的真实关系，以为在理智理性基础上构造的现实体系已经彻底改变了生活世界，抹煞了一切差别和具体。这一对现代社会的极端否定态度明显没有看到知识进步、现代社会的分化对于揭示生活世界的本质所具有的新意义。既然理智理性的主观性与现实的真正合理性本身存在差距，就应该解释理智理性与现实的合理性、超越性之间真正的关系，阐明生活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及其本质。但是理性批判本身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没有去揭示生活世界本身中存在的超越性和能动性，而是转而证明主观形式的社会原理在意识关系中可以得到证明，或者证明一般道德来自主观意识的构造。批判现代性绝不应该是只证明道德真理的真理性，而是

应该深入到社会事实之中去，面对现代生活抽象的单一体系与生活世界全面性之间的对抗，不再仅仅停留于主观理性中找到真理。

## 二、作为意义和价值尺度来源的生活世界

对生活世界理性重构的批判本身就意味着生活世界构成了这种批判的尺度，纷繁复杂的生活世界需要发展，同时又作为发展的目标而包含着对自身发展的评价尺度。生活世界理论正是要揭示出生活世界的真实结构、阐明生活世界何以成为评判自身和理性认识的价值标准，但是当代西方哲学的生活世界理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

生活世界理论是由胡塞尔首先明确提出来的，因为他首先明确要把生活世界作为科学的专题和课题，强调以生活世界是真理的来源为出发点阐明普遍规范真理的意识构造。正是由于现象学生活世界理论的影响，生活世界理性重构的问题在海德格尔、舒茨和卢曼那里开始转变成日常经验意识如何超越自身的问题，由此也导致哈贝马斯摆脱以个人意识为中心的理性，重建交往理性。

在胡塞尔看来，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理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观念只是自然思维，在自然思维中认识的对象实际上已经潜在地被主观预定了，自然思维本身并没有反思自身对这些对象的认识构造，却把主观预定后的认识当成了客观现实。现象学主张，真正的科学应该关心全部存在者，成为塑造真正人的自由理性科学，它要求摆脱主观性、回到事情本身和全部存在者，承认自然和社会的真理在反思之前已经呈现于意识活动之中。意义和一般真理的基础是前科学的个人意识活动领域，在活生生的经验意识之流中，才能保持世界本身在意识中的表现。进一步来说，在纯粹的经验意识之流中，保持态度的经验是一种赋予意义和构成价值的次级被动经验，意义正是通过这种原始的主观能动性超出了意识流，成为反思未分化经验的结果。通过对意识流的分割，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即生活世界才被构造出来。只作为意义的生活世界是前科学活动中的主观构造物，个人可以通过普遍怀疑摆脱自然思维的有限预设，发现在意识活动中人自由塑造自己，不断构造更为普遍的真理和意义。这一构造物并非是单纯个人意识的世界，而是主体间性世界、个人与他人共在的意义世界直接显现给意识的结果。自然思维不反思这种对象和意义的构造过程，以自己的预定为客观事实，代替生活世界，只能是停留于有限的认识中，并且遗忘作为意义的生活世界，以有限的预设取代存在者赖以生活的、充满可能性的意义世界。只有回到生活世界的意义构造之中，才能对日常思维、自然思维、日常熟知的秩序、日常的生活世界提出质疑，揭示日常的生活世界和近代自然科学世界中自然事物、社会经验的虚构性和有限性，伪装的意义、对生活世界意义构造的遗忘才能被超越。

在舒茨看来，胡塞尔从先验还原来解决主体间性的问题并没有成功。舒茨认为，日常的生活世界的基础虽然没有被验证，但是它并非绝对是同质和僵死不变的，而是包含着客观的能动构造过程，各种观念意识相互交错影响，并且构造着社会世界的普遍生活意义。日常的生活世界给日常活动提供了意义框架并且随着这种活动的变化而被调整，个体对其他个体的经验是普遍共识的前提，普遍意义的形成是一个社会意义的建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的人并不深究超越性的一般真理如何形成，但是他迟早会遇到日常生活意义的界限。在危机中，根据手边的典型给出的有限解释、熟悉的日常秩序、给定的事实崩溃了，自然态度将被迫转变为理论态度。社会成员必须不断地把内在活动联系为一个统一体，改变生活意义的普遍结构来指导日常实践活动。舒茨这种论证社会意义一般真理性基础的方式不同于先验现象学，他从客观分析个体如何在经验活动和自然态度中形成有限的生活世界观念开始，通过个体所进行的意义建构和对他人的经验，进而阐明超验生活世界观念的形成过程。

生活世界无疑是日常经验活动的意义源泉，但是现象学传统单纯从个人意识活动出发，把社会真理看成是会自行向个人显现的现象学无疑没有真正说明生活世界本身。生活的意义是在社会历史中现实存在的，正如对生活意义的丧失也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样，不能脱离真实生活中的价值来解释主观形式的原理。现象学传统不考虑社会真理的社会生活内容，而是从个人的抽象意识活动及其内在关系证明一般意义的真理性；它仅仅把日常思维中的生活世界看成是不需要批判就已经存在的最初生活世界，这只能使存在的真理本身蒙上神秘面纱，并不能说明遗忘生活世界作为主观形式的价值源泉的原因，并且提供一个有效克服这种遗忘的途径。把现象学的主要任务看成是寻找社会原则的真理性在意识活动中的根据，只能批评按照理智知识构造生活世界的局限性，而并不能揭示真实的超越活动和斗争。在现象学基础上的日常生活批判也只是抓住了作为经验活动模式的日常生活世界，拒绝这种模式下的日常思维对生活世界本质的遗忘，但是并没有说明生活世界的真正本质是什么，日常生活能动性和被动性的辩证关系也没有得到说明。

## 三、生活世界的实质及其作为批判原则

历史、现实和理想是交织在实际生活世界之中的三个基本维度，人所创造的生活世界并不是单纯主观性的意义世界，它也是在人的各种实践活动和交往关系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实际生活世界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与这些活动和关系紧密相联。揭示生活世界的本质，进而改造日常生活模式和人的现实生活，离不开认识这些现实矛盾和冲突的特征和实质。

与古代文明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狭隘的关系不同，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开创的生活世界是一个高度分化和多样化的世界，同时它又是一个在本质上趋向于被整合为单一体系的世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消灭了封建等级、行帮和特权带来的社会分裂，摆脱了分散的政治力量，是在提出以普遍人权为公共政治理想的同时，却宣布普遍人权是与他人、社会隔绝的私人权利，导致了公共生活和政治权力变成利己主义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在政治上取消以财产、等级特权、文化程度和职业作为资格来确定公民政治权力，不仅没有消灭私有财产，反而要以它为前提；个人只有作为私人才能成为公民，政治生活中的普遍平等建立在现实中的普遍不平等之上。个人作为公民是抽象的纯粹个体，而现实生活中完全是自私自利的经济存在物；公民生活成了实际生活的彼岸，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被割裂开来。这种分裂不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的构想中，在它所建立的生活世界中还存在着多重分裂。

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使生活世界分裂的原因在于现代生产劳动体系的原则和权力技术原则越来越趋向于替代和排挤生活世界本身的准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倾向于把一切都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使人的活动和交往关系建立在片面原

则上。等价交换的理性计算原则和以物为目的的生产体系抹煞了劳动的个性和丰富性，使具体劳动简单化为无差别的劳动，而这种抽象的无差别性成了新的社会关系纽带，掩盖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系，把人的全部关系都抽象成商品关系。交换价值生产体系意味着一切生活原则都要服从交换价值规律，它倾向于取消生活世界的复杂性，把生活世界变成一个完全的交换价值劳动世界，在其中人成了能够提供一般价值的商品化劳动力，人的关系变成物的关系。

马克思以生活世界为前提批判交换价值生产体系对人的片面化，实质上强调的是劳动分工体系应该提高人的多样化经验才能，发展人的全面交往关系，而不是取代生活世界的全面性。在他看来，“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须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物质生活的生产应该以人类本身能力的发展这一自由王国的实现为目的。他反对把劳动纳入到以物——资本为目的的生产中。一方面，他强调必须扬弃资本主义劳动的非人性质，实现劳动领域的自由；另一方面，他指出物质生产劳动并非生活世界的全部：“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页）。在他看来，人不应该仅仅是承担一种社会职能的局部的个人，在单一尺度上再生产自己，而是应该尽可能全面发展，发挥自己才能的总和。

从人的交往关系来看，在劳动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物的交换价值关系不能等同于人的全部社会关系。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生产的原始条件本身不可能是生产出来的，不可能是生产的结果”（同上，上册，第486页）。最初，血缘共同体是劳动的前提而不是劳动的产物，甚至它规定着原始劳动的共同体性质及其发展，“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马克思，第96页）。这种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只是随着交换的最后发展，这种共同体关系、依附或统治关系才彻底被打破，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取代了个人之间直接的关系。马克思主张打碎这种物的关系对人的统治，建立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的共同生产，“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经验劳动能力的多样性和人的感觉经验的丰富性是人类劳动的真正基础。资本主义不但把具体劳动发展成单一尺度基础上的交换价值生产体系，还以只是生活世界必然性基础的物质生活生产来充斥人的全部生活，抹煞人的丰富生活世界。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生活世界的激烈冲突和对抗的性质。他维护生活世界丰富活动和全面关系的价值地位，强调了建立在知识理性基础上的劳动能力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只能是提高生活世界水平的基础，而不能取代生活世界，这意味着生活世界的本质在于人的经验活动才能的多样性和交往关系的全面性。

生活世界之所以能作为价值理想和评判尺度，完全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人的活动的全面性和人的交往关系的全面性这种真实和能动的力量。价值是一种真实的关系，价值原理不过是这种关系的主观反映。在现实经验活动和交往关系中，就存在着真实的超越关系；人的超越性是一种现实能动活动的超越性，而不单单是内在世界中个别意识对自身的超越。现象学传统把主观价值理想源于生活世界看成自明的前提，并不知道生活世界本身何以成为一般价值的源泉以及一般价值的内涵是什么。它停留于内在世界之中来证明一般意识的存在，似乎只要证明了意识的超越性就能克服近代抽象的理智文化，然而实际上不过只是证明了抽象理智对现实的构想的失败。政治自由主义把人的社会性看成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保证共同利益的道德规则，不但不承认个人和社会内在的一般道德原理，根本上还把社会性的维持建立在外在的国家权力统治上。社群主义强调一般道德真理的实质性和历史基础，但是把解决时代的矛盾还原为个人内在的共同体道德意识的建设，无视当代社会分化的现实。

多元化的利益和文化冲突的现实也并非就是生活世界的真实本质。面对多元化发展的现实，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多元主义只是停留于利益的多元性，不过是承认了这个生活世界不合理性与合理性之间的斗争。但是承认利益多元性并不等于维护了生活世界的全面性，因为它在根本上默认了生活世界中诸多片面性的分化领域，没有积极肯定生活世界的真正全面性内涵。所谓全面性并非指现存的斗争复杂性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日常生活的复杂化结构，而是就人的基本活动结构特征而言的。这种活动不能只建立在单一的现实原则或主观原则之上，相反，人历史地创造和超越了这些单一原则。人的经验活动的全面性和人的关系的全面性也不是抽象的人性，它有其自然基础，即感官的丰富和人与人的生活交往关系，这两者又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拓展和变化的。个人与社会的真正统一关系不是建立在道德心、道德规范、技术、经济分工、交换价值原则或国家强制之上的，而是根本上立足于生活世界的本质。个人的全面性维度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统一关系。知识理性只有揭示出这一真实的生活世界，才能成为实践的力量和理想形式，从而引导我们去改造日常生活世界的观念，重新塑造一种日常现实活动的形式。

## 参考文献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与不可能》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2卷，洪佩郁、藺青译，重庆出版社。

胡塞尔，1999年：《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三联书店。

《胡塞尔选集》，倪梁康编，上海三联书店。

马克思，1975年：《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9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人民出版社。

Lefebvre, H., 1971,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Penguin Press.

1991,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1, Verso.

Pollio,H.;Henley, T.and Thompson, B , 1997, *The Phenomenology of Everyday Lif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utz, A., 1973, *The Structures of Life-World*, Vol.1、 Vol.2,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黄慧珍·学术评论·(《哲学研究》2003年第1期)